

张晓虹 著

匠人营国

匠人营国，

方九里，

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

经涂九轨。

左祖右社，

面朝后市，

市朝一夫。

——《周礼·考工记》

中国历史上的古都

The Ancient
Capitals and Cities

致天下之民 / 造郭以守民 / 聚天下之货

in
Chinese
History

江苏人民出版社

匠人 营国

张晓虹 著

中 国 历 史 上 的 古 都

The Ancient

Capitals and Cities

in

Chinese

Histor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匠人营国：中国历史上的古都 / 张晓虹著.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8
ISBN 978-7-214-16775-0

I. ①匠… II. ①张… III. ①都城(遗址)—介绍—中国 IV. ①K9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03465 号

书 名 匠人营国：中国历史上的古都

著 者	张晓虹
策 划 编 辑	石 路
责 任 编 辑	石 路
责 任 校 对	孟 璐
装 帧 设 计	刘葶葶
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6.75 插页 4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8 月第 1 版 202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6775-0
定 价	58.00 元(精装)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张晓虹, 女, 1965 年生。1997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同年留校工作。现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中心主任、《历史地理研究》期刊副主编。

主要从事历史城市地理和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著有《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古都与城市》, 编著有《万民所依: 建筑与意象》《洞天福地》等, 在 SCI、SSCI 和 CSSCI 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

责任编辑 石 路

装帧设计 刘亭亭

引 言

按照中国传统,中华文明史起自三皇五帝时期,号称“中华文明五千年”。我们或可认为三皇五帝不过是中华共同体形成之初“王天下”的代表人物。^①但在传说中,神农曾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②的事件发生。另一位传说中的人物黄帝,据说也曾“为五城十二楼”。^③大禹的父亲鲧更有“鲧做城郭”^④之说流传下来。这些记载或传说其实都表达了一个意思:在中华共同体形成初期,城就相伴而生了。

更重要的是,这些传说都被当代的考古发现间接证实。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大量城址,暗示着那些传说并非无本之木。目前已发现的黄河中游地区山陕蒙交界地区大量的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城,长江中游地区属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诸城址,长江上游地区属宝墩文化时期的诸城址以及长江下游的良渚特大城址等,从时间上来看似乎都属于三皇五帝传说时代的城。

在人类社会早期,城与国往往合为一体,一城大多就是一

① 参见吕思勉:《先秦史》第6、7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

② 《汉书》卷24《食货志上》。

③ 《汉书》卷25《郊祀志下》。

④ 《世本·作篇》。

国，一国更多的只有一城。这些国或城分散在神州各地，规模、形式并不见得都相同，但相互之间却总有些联系，或争战、或交易，就在这分分合合、纠结不清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中华共同体，城也就成为这一民族共同体重要的物化标志。^①

到了夏商时期，中华共同体已经稳步发展，并在中心地带的河洛地区首先建造了最早的都城。被认为是夏代都城遗址的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而商的早期都城亳，位于今河南偃师，后来再迁到今河南郑州，史称濞，再迁至今河南安阳洹水畔的相城。这些城池从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都规模宏大、雄伟壮丽。除了这些位于黄河流域的大型都城外，长江流域这一时期也出现不少的城址，甚至这些城址的规模与出土的文物并不逊色于河洛地区的都城，其中最典型的是浙江余姚良渚遗址、广汉三星堆遗址，以及湖北黄陂的盘龙城遗址。

夏商之后的西周，在武王伐纣，尤其是在周公平叛三监之乱后，封建诸侯，以屏藩周。各诸侯就国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建王城。而周公率先垂范，在洛水之滨兴建成周。由于周王室推崇“大聚”，所以，各国诸侯纷纷兴筑大城，并延续了外郭内城的制度。再到后来，狼烟四起的战国时代更是进入了修城的高潮时期，在《左传》中我们就可以常常看到“城”某地的记载。这里的“城”是动词，也就是修筑城墙、兴建城市之意。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了第一个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并改西周实行的分土而治的封建制为分民而治的郡

^① 曲英杰：《古代城市》，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5 页。

县制。秦虽二世而亡,但其制度却为西汉政权所继承。汉兴之初,高祖刘邦即“令天下县、邑城”。^① 据此,全国兴起了一波筑城的风潮,这一记载也为考古出土所证实:西至后来为武帝所征服的河西地区,东到沿海,南到岭南,北抵阴山,到处都有汉代古城的发现。不过,除了皇都长安,以及西周延续下来的诸侯国都外,大多数郡县邑城规模狭小,与后世的通都大邑相比,不足为道。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当时即便是通都大邑,也多没有规划,基本上是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甚至连国都长安,也不过是一个宫殿集中分布、官署杂错其间的城区,城墙是在多年后才修建起来的。至于所谓的“南象南斗,北象北斗”的斗城之说,其实不过是西汉长安在将修建城墙时,因建城区域形状不规则,城墙不得不曲折避让的结果,并没有后世所描述得天花乱坠的理念蕴含其中。

但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从此成为统治阶层主导意识形态,都城的实体建设也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尽管两汉都还来不及将儒家的礼制完全贯彻到都城规划与都城建设中,但这一理念却从此深入人心,因此无论是六朝建康,还是曹魏邺都,都力图在城市建设中体现出儒家礼制,把国家意识形态具体化。不过,这一时期真正把儒家礼制运用到都城建设中的巅峰之作却出自鲜卑族所建立的北魏政权,他们所营建的都城洛阳堪称当时最能体现《周礼·考工记》原则的佳作,并显然启发了后来宇文恺营建隋都大兴城的思路。而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后文中详细论述。

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都长安及东都洛

^①《汉书》卷1《高帝纪》。

阳城市建筑宏伟壮丽。其规划整齐的坊市，巍峨壮观的宫城，成为当时周边国家，如日本、渤海国和南诏国争相模仿的典范。事实上，唐代的长安确实是将儒家礼制应用到都城规划中的又一个经典之作，它直接承袭了北魏洛阳的规划思想与城市布局理念，并且对后世的都城规划影响深远，尤其是元大都的修建隐约透露出唐长安的影响。

这一时期中国的城市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国都之外的城市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长江流域的扬州与益州（今成都）“号为天下繁侈”，其城市规模与经济生活都达到了十分可观的水平。事实上，这也是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一个重要表征，由此反映出经济活动已开始在城市发展中居于重要位置。

宋、辽、金、元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从都城规划上，出现了元大都这样完美地实现了《周礼·考工记》儒家礼制的都城；与此同时，地方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大批地方城市，其规模与地位可与都城分庭抗礼。因此，这一时期是从唐代到明清时期的重要转折时期。

被西方汉学家称为“帝国晚期”的明清时期，城市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城市规划方面虽没有创新，但地方城市的兴起，使得城市在全国经济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市镇经济的发展，几乎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经济特征。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列强的进入，沿海、沿江地区开埠城市的出现，则完全改变了中国城市的旧有格局与景观，成为学者所称的“镶嵌在老式长袍四周的新式花边”。

目 录

引 言 1

上编 考古与传说时代

第一章 城·市——早期城市的起源 2

一 致天下之民 7

二 造郭以守民 16

三 聚天下之货 19

第二章 都·邑——夏商周都城 22

一 夏都二里头遗址 22

二 盘庚迁殷与殷墟的发现 27

三 武王伐纣与丰镐二京的建立 31

四 营建成周 37

中编 古 都

第三章 京·师——国都的确立与转移 40

一 定都之议 40

二 四塞之地长安与四方之中洛阳 52

三 天下之枢开封 58

四 南北往复 62

第四章 都·京——首都与陪都 71

一 东西二京 71

二 五京制度 73

三 京师拱卫 82

第五章 城·郭——都城形态的演变 90

一 匠人营国 90

二 居主奥区 96

三 承天之序 110

四 万世之邦 118

第六章 里·坊——都城社会的发展 148

一 闾里阊阖 148

二 坊肆谨严 151

三 绣旆相招 160

四 勾栏瓦舍 178

下编 城 市

第七章 市·镇——城市与经济 184

一 宋代草市 186

二 明清市镇 195

第八章 水·城——城市与交通 211

一 水陆会通 211

二 运河城市 221

三 江海通津 229

第九章 中·外——城市与中外交流 235

一 丝路城市 235

二 开埠城市 242

上编 考古与传说时代

第一章 城·市——早期城市的起源

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城市。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看法。

一些治城市史者又在经济因素之外增加了技术和文化因素。如美国著名的城市理论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市“由村庄演化而来,村庄连同周围的田园,构成了新型聚落。人们渐渐学会了制陶、灌溉、耕作,建成了最初的房屋、圣祠、蓄水池、公共道路、集会场地。人类这一系列技术发明和改造自然的行为就是后来形成城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先于城市进行的。”而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柴尔德则在城市形成因素中,加入了文化要素:他指出聚落规模、人口规模和大型建筑、剩余产品的出现、阶级的分化、文字的发明、社会组织的是早期城市的特征,这其中大型建筑和文字明显属于文化的范畴。^①

^① 柴尔德:《城市革命》,载孙逊、杨剑龙主编:《都市文化研究》第6辑《网络社会与城市环境》,三联书店2010年版。

具体到中国早期城市的特征,学术界争论不休,并没有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早期城市应该有五大特征:防御性的夯土城墙、战车、兵器;政治性的宫殿、宗庙与陵寝;宗教性的祭祀法器与祭祀遗址;经济性的手工业作坊和形态性的聚落在定向与规划上的规整性。^① 这一总结是张光直先生基于他对商代城址的考察得出的。另有一些学者不完全同意这一观点,或强调要从中文“城市”涵义出发,即城市必须是同时具备军事防御与经济贸易两大功能的聚落形式。^②

由上述关于城市起源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对城市的认识并非是简单的形态学的意义,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学者大多是将城市起源置于文明和国家的探源中考量,城市的起源往往成为判断国家政体存在的依据,在一个区域中追溯原始村落到城址的发展历程,实际意义在于探索人类历史早期的社会演变轨迹。^③ 而以历史学为基础的学者,则更拘泥于传统文献中的含义以及与后世城市功能之间的历史关联。

正是基于这样不同背景的学术考量,在多年激烈而严肃的讨论之后,对中国城市起源的认识逐渐汇总为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原始社会后期的龙山文化,就已出现了城市,因为考古学家已经在中国各地发现了大量龙山文化的古城址,表明当时的人类已经有能够组织修建大型工程的社会机构,社会形态也不再简单,甚至可能已形成国家的雏形,这些城就

① 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载张光直著:《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 1999 年版。

② 郭正忠:《城郭·市场·中小城镇》,《中国史研究》1989 年第 3 期。

③ 陈淳:《聚落考古与城市起源研究》,《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4 年第 1 期。

是各个社会组织的权力中心,这样的城可视为早期的城市^①;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早期城市出现于原始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之后,早于农业与手工业相分离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并且认为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分工并不是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而是城乡分工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②

其实,这两种意见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从考古学出发,后者强调的是社会组织已有一定的复杂程度。但我们从目前发现的大量龙山文化的城址来看,其规模巨大,不仅有防御性的城墙,而且城址内部有明显的职能分区,以这样的城址状况,如果其社会组织没有发生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是不可想像的。

早期的人类,由于征伐不断,所以必须建立有效的防御体系,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因而就形成了在居住地区修筑城墙的特点。但是修筑城墙与社会组织之间必须有一定的联系。这一点古人早已认识到,如早期典籍《黄帝内传》《世本》《淮南子》《吴越春秋》等就记载“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其中筑城是“卫君”的,君是社会组织的管理者,有君就说明已有一定的社会分工,社会组织已经有一定的复杂程度。

从目前我国考古发掘报告来看,我国筑城的历史非常悠久。虽然在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都有聚落遗址发现,但明显的是仰韶文化聚落遗址以村落为主,如半坡遗址比较有代表性。其聚落虽然有防御性的沟壕围绕,遗址中部亦有一公共建筑,但整体来看,聚落内部以居住房屋为

① 张喜庆、王立华:《中国早期城市起源理论初探》,《兰州学刊》2017年第3期。

② 何一民:《第一次“城市革命”与社会大分工》,《甘肃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主,没有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和特定功能的区域。因此判定这是一个以农耕渔猎为主的村落遗址。仰韶文化遗址大多如此,反映出这一时期尚未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工,社会结构也比较简单。而龙山时期的城址不同,大多建有规模宏大的墙体,甚至有学者认为龙山文化时期是我国城郭之制孕育、形成的重要时期。^① 遗址内部有明显的区域功能分异,并且不少遗址还发现有大型手工业作坊遗迹和宫殿遗迹。这样的聚落遗址,明显已有早期城市的功能与职责。虽然大型的史前城址广泛分布在我国南北方,但以黄河流域为主,约有 40 余座。^②

后期城市的主要要素——商品交易,也就是市场,开始时和城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世本·作篇》中有颛顼时“祝融作市”。唐代学者颜师古对此注称:“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这是说早期的市场,只是进行物物交换的场所,大多数情况是人们就近在每天汲水的井边进行交易,并没有专门的场所,最多也是与今天的农贸市场或农村集市相似,与城的关系不大:前者为了“买卖”,后者为了“盛民”,互不相干。

至于与后世内涵完全一致的城市,在中国最晚应该出现在西周时期。著于战国时代的《易·系辞》中有十分明确的表述: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① 张国硕、王琼:《史前夏商城址城郭之制分析》,《中原文物》2014 年第 6 期。

② 曲英杰:《古代城市》,文物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 页。

在这段文字中的“噬嗑”是卦名，意为设法以合物，也就是彼此合宜的意思。国即为国都，廛则是市场。城、市首次在这里合二为一。更重要的是，这段文字强调了都城中的经济功能：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还有一个文献证据是被认为成书于西周时期的《周礼》，其中有“司市”之名，说明市场的设立和管理已成为政府行政职能的一部分，而且也明确了这一职司的管理职责：“平市”“均市”“止讼”“去盗”“除诈”等。这一时期国都的市场已是一个固定的场所，按时启闭，定时交易。《周礼·司市》中如是说：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

如此看来，西周时期城市无论是职能还是形态已与后世并无二致，这说明城市在这一时期已完全发育成熟。

不过，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即中国城市虽然在西周时期已完全形成，其形态与后世基本一致，但在西周的文献中却并没有“城市”这个专用名词。最早将城市连在一起使用，是《诗·邶风·定之方中》。这首诗在讲到春秋时期卫文公徙居楚丘后，“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只是这里的城、市各有其意，并不是后来我们常用的“城市”概念。在《战国策》中则有“城市邑”的说法，如《战国策·赵策一》中，赵国曾割“城市邑五十七，命以为齐，而以求安平君而将之”。同一时期，韩国为了阻挡秦国，求救于赵时，许诺“有城市邑十七，愿再拜献之大王”。^①可见，战国时期

^①《资治通鉴·周赧王五十三年》。